

新中国文学记忆:壮阔中有灵动的游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余秋雨开始了他漫长的“文化苦旅”。那时,他已出版《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学术著作,出色的艺术感觉和散文般的诗意语言使他在学界获得不错的口碑。但他不满足于埋首书斋的单调生活,“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

另一个触发余秋雨决定“行万里路”的诱因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理查·谢克纳。这位比余秋雨大20多岁的教授“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回到上海仍毫无倦色,逛城隍庙时竟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这种生命状态令余秋雨钦佩和羡慕。于是,他开始借助各种外出讲学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文化旅游。余秋雨发现自己想去的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地方,站在那里就会感到人、历史、自然交融在一起,自然山水也成了一种“人文山水”,而写文章的冲动再也止不住了。他回忆说:“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

1987年,《收获》杂志副主编李小林收到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余秋雨从外地寄来的两篇散文。余秋雨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他在来信中说自己正在西北做

课题调查,走的是一次“文化苦旅”。李小林说:“我们正好对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很感兴趣,如果没有这四个字,可能就作为散文发了,但是看到这四个字,我们一下子觉得很有意思。”由于李小林的催稿和督促,余秋雨坚持写了下去。1988年,《收获》第1期以“文化苦旅”为专栏名,开始发表余秋雨的散文,这也是这本重要的文学杂志第一次请作家以专栏的形式连续发表散文。从第1期至第6期,《收获》先后发表了《阳关雪》《悬崖石室》《沙原隐泉》《牌坊》《庙宇》《白发苏州》《洞庭一角》《道士塔》《莫高窟》《柳侯祠》《白莲洞》《酒公墓》《贵池傩》《西湖梦》。除了《悬崖石室》,其余后来均收入散文集《文化苦旅》。

专栏文章推出后,引起关注和好评,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7家著名出版社和海外出版公司都寄来出版约请,但《文化苦旅》一书的出版并不顺利,简直是经历了“死里逃生”。

当时作为《文化苦旅》责任编辑的出版人王国伟任职于上海知识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的前身之一),他与余秋雨交往多年。王国伟在2015年出版的《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中详细回忆了《文化苦旅》出版的波折。先是南方一家出版社获得余秋雨的同意,“可他们却误判了《文化苦旅》的价值,只是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类似于旅游指南的小册子。当然,内容就不需要太多,他们提出要余秋雨删掉部分内容”。余秋雨不同意,就委托李小林帮他收回了书稿。随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愿意出版,但要放到该

社出版多年且有许多作家加盟的散文丛书中。余秋雨认为散文丛书参加的人太多,而且开本太小,便搁置了此事。后来,王国伟去余秋雨家,余秋雨谈起了《文化苦旅》出版的不顺。王国伟当即表示把稿子交给他。在王国伟的眼中,当时的书稿在余秋雨书房的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惨不忍睹。“稿子很零乱,一堆稿纸大大小小,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拼接的。稿子上满是那家南方出版社各种色笔画画改改的痕迹。”这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初版后记中所描述的,“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画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我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

拿到稿子的第二天,王国伟找了一位退休的资深编辑,请他用稿纸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阅读书稿之后,他将出版建议告诉总编和社长,得到大力支持,并告诉余秋雨,书的内容不够,需要补写和充实,加强文化的厚重感。因此,余秋雨又补写了《风雨天一阁》等篇章,书稿从原来的18万字增加到23万字。书稿立项后,王国伟又找了圈内一些朋友阅读,大家评价都不错,更增添了出版的信心。1992年3月,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苦旅》终于面世。这本书曲折的出版也经历了“苦旅”,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本畅销书,而且连续畅销几十年。

“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专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对散文创作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一方面,散文创作落后于小说和诗歌,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需要新的开拓,尤其是要超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散文笔法;另一方面,散文里充满风花雪月和甜腻之风,散文的格局小、境界不高,比如一些庸俗的游记散文。《文化苦旅》在《收获》上连载时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一组关于《文化苦旅》的笔谈得到余秋雨的特别关注。1989年第2期的《鄂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推出了“《文化苦旅》笔谈”。在笔谈的“编者按”里,策划者提到在1988年《收获》上连载的系列散文《文化苦旅》引起本校中文系几位老师的兴趣,并指明“组织这次笔谈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当前散文领域的沉闷局面,以引起创作及评论界的注意,推进散文的发展”。在笔谈文章之前,是余秋雨应邀写的《再谈〈文化苦旅〉》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说自己近年来学术上思考最多的是以中国文化史为背景的中国文化人格,一接触山水,就把自己的感悟投射上去。他认为当代散文有两重痼疾:一是过小,即沉陷于琐碎的小格局;一是过大,即流之于空泛的、消弭个体的大观念。散文的大气必须以个体人格格局为支撑。同时,余秋雨认为《文化苦旅》每篇写得匆忙,瑕疵甚多,希望看到更多展现不同生态和心态的散文。

这组笔谈文章分别是熊家良的《对文化与人的理性思考》、曹毅的《漂泊者生命主题的寻求》、张应斌的《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召唤》、毛宣国的《关于〈文化苦旅〉的文体特征》、毛正天的《一项新的艺术创造工程》,五位作者当时都是鄂西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这组文章从多个角度解读《文化苦旅》,然而凸显理性品格、浓厚的文化意识以及对古典散文章法气势的借鉴等成为五篇文章比较集中的看法。今天来看,五篇文章中的不少观点仍然是经得起检验的。(未完待续)

据《光明日报》

一、左姓起源

(一) 以职官为氏

左姓系以职官为氏。春秋时,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大都设有左史官,周穆王时有左史戎夫;楚灵王时有左史倚相。他们的子孙后代有的便以其职官名左史的“左”为姓氏。见《姓氏考略》。

(二) 齐公族左公子之后

据《元和姓纂》载,左姓出自姜姓,春秋时,齐国公族有左公子和右公子之分。左公子的后代有的便以“左”为姓氏。

又《中华小字典》引《通志·氏族略》云:“左,姓也。齐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为氏焉。”

(三) 黄帝时已有左氏

据《姓氏考略》载:“黄帝臣左彻,为左姓之始。”

又古有左国,以国名为氏。相传黄帝臣左彻为其后。见《中国姓氏大辞典》。

二、名人传略

左思(约250—305),西晋文学家。字太冲,山东临淄人。出身于寒素之家,“二十四友”之一。其代表作《咏史诗》八首,借古讽今,批判了士族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抒发了寒门士人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心曲。



■胡秀华

其诗风高亢雄迈,刚健质朴,语言简劲,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钟嵘认为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刺之致”,誉之为“左思风力”。左思的《三都赋》有“洛阳纸贵”之誉。

左良玉(1599—1645),明末将领和大臣。字昆山,山东临清人。初为辽东车右营都司。明崇祯元年(1628),坐宁远(今辽宁兴城)兵败削职。

后被荐拔为副将,率军援辽与后金军作战,录战功第一。不久奉调山西、河南等地镇压农民起义军,与农民军交战互有胜负,渐升至总兵。十一年(1638)春,接受农民军刘国能部投降。随即又在南阳击败张献忠部,迫其南奔湖广接受招抚。次年七月,率军进剿起义的张献忠,在房县(今属湖北)罗猴山遭伏击大败。十三年春,以督师杨嗣昌推荐拜为平贼将军,统兵与陕西明军挫败张献忠于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境),因功加太子少保。十五年(1642),与李自成农民军战于河南朱仙镇等地,损失惨

重,后退兵驻守武昌,封为宁南伯。十七年(1644),李自成兵进北京,崇祯帝自杀。南京福王立,晋升左良玉为侯,加太子太傅。清顺治二年(1645)三月,为避战李自成大顺军,借口“清君侧”,率军顺江东下进兵南京,四月,至九江(今属江西)病死,年47。

左宗棠(1812—1885),晚清重臣,著名将领和军事家。有晚清中兴名臣之誉。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早年曾中过举人,后三次入京会试均名落孙山,遂发誓不以进士为荣,企图“建功立业”,努力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同时对疆域沿革、历代军事和农业经营亦颇有兴趣。咸丰二年(1852),时值太平军进攻长沙,左宗棠出山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守长沙,因功升知县,又升任同知衔。骆秉章任湖南巡抚时,左为骆的幕僚。六年,授兵部郎中。十年(1860),清政府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

藩襄办军务,在长沙建立“楚军”。同年9月,亲率楚军自长沙赴赣、皖交界地区与太平军作战,胜太平军,升太常寺卿。次年底受命督办浙江军务,升任浙江巡抚。同治二年(1863),擢闽浙总督,督率楚军攻陷金华、富阳、杭州和嘉应州,帮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军,晋封一等侯爵。五年(1866)七月,创设福州船政局,制造轮船,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做出了贡献,成为洋务派人物之一。是年9月,调授陕甘总督,率军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后晋太子太保衔,加一等轻车都尉、东阁大学士。光绪元年(1875),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64岁高龄组建西征军,讨伐和歼灭阿古柏匪帮,迫使沙俄交还伊犁,将脱离祖国十余年的新疆一举收回,使之重回祖国怀抱。左宗棠以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而名垂青史,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不可多得的爱国将领。七年(1881),左宗棠由新疆抵北京,以东阁大学士充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管理兵部事务。同年9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年(1884)夏,应召入京,再值军机。中法马尾海战后,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指挥抗法军事。十一年(1885)九月,病卒于福州,年74。赠太傅,谥文襄。著有《左文襄公全集》。

据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姓氏起源考与历史名人》